

江苏档案

江苏省档案局 主办 (第一一七期)

传奇英雄华克之 从刺蒋左派到共产主义战士

在宝应县革命烈士陵园里,华克之同志的雕塑铜像静静地坐落在松柏环绕中。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想出头、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七排大字,这是华克之于1937年5月4日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面对毛泽东主席向党组织所作的庄严承诺,也是他加入党组织后半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守信念,无怨无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崇高精神的真实写照。华克之曾因组织刺蒋行动震动全国,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是一位有着许多传奇故事的英雄人物。



党的“秘密战线”杰出战士华克之



华克之铜像坐落在宝应县革命烈士陵园

主持“刺蒋行动”的爱国义士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动的统治,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华克之离开了生活近10年的南京,只身去上海租界,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斗争。

1929年夏秋之交,华克之住进上海法租界神马路法政大学对面的新新南里232号小楼上,和他同住的还有同乡好友、中共地下党员陈处泰(又名陈桐子)。随后,他们的同乡张玉华也放弃了南京金陵大学的学业,来这里寻找革命出路。再然后,孙凤海也来了,他是江苏徐州人,淞沪抗战时在十九路军做过排长。华克之的周围迅速聚集了一批曾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包括王亚樵、李怀诚、任庵、陈光国、葛天民等。华克之给这间小楼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危楼”,自称“危楼楼主”,表明他们时刻准备把一切包括生命献给拯救国家和民族伟大事业的决心。陈处泰经常向华克之等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朋友们聚在一起,关心时局,忧愤国事。谈起蒋介石对内排除异己,压制抗日民主力量,对外一味妥协,致使中华民族的危机加深加重种种行为,无不咬牙切齿。

国家的局势迅速朝着坏的方向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孤军英勇抗战,因无援而失败。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面对国家的忧患和民族的存亡,华克之

和他的朋友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经过反复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反动派,国家要得救,唯一办法就是刺蒋!陈处泰得知华克之等人的刺蒋计划后,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向华克之等人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你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华克之等人血气方刚,没有接受党组织的意见,决定实施他们的刺蒋计划,并再三表示这次刺蒋行动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华克之等认为,能够到处打听消息,随时跟踪和掌握蒋介石的动向而不被人怀疑的只有新闻记者。1934年11月初,“南京晨光通讯社”在南京市陆家巷23号成立。华克之化名富商胡云卿担任社长,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波光,孙凤海化名孙凤鸣任记者。晨光通讯社成立后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精心策划了多次刺蒋行动,都因戒备森严无法接近。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他们获知这个消息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在会上动手。华克之担任刺蒋行动总指挥,而枪法精熟的孙凤鸣则毅然担负起刺客的重任。实施刺蒋义举前,大家在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为孙凤鸣摆酒壮行。孙凤鸣临行前将他珍爱的一支金笔送给了华克之,作为永久纪念。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除西南派的粤、桂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冯玉祥、阎

锡山、张学良、汪精卫等要人均参加了会议。孙凤鸣由于获得采访会议的“特别记者证”比较晚,进场时正赶上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前集中合影。于是,孙凤鸣决定趁合影之际刺蒋。但是,生性多疑的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便借口身体不适,独自躲进了休息室不肯出来,转由汪精卫作代表,与众人合影。镁光灯闪过后,置身记者群中的孙凤鸣见蒋介石没有露面,临时决定刺蒋汪精卫,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第一枪射进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颞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汪精卫后背射进第六、七胸骨旁。汪精卫的侍卫立即还击,向孙凤鸣鸣枪连开两枪。经过紧急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一条性命。孙凤鸣中弹倒地后被送往医院,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于11月2日凌晨牺牲,年仅30岁。

国民党中央党部突然响起的枪声,震惊了全国。蒋、汪之间素有矛盾,蒋介石遂成为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场抓住蒋介石又哭又闹,不依不饶。而桂系头子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事出突然,弄得蒋介石百口莫辩,非常被动。蒋介石大发雷霆,严令戴笠限期破案。

华克之等人在这次行动之前作了周密的安排,除孙凤海之外,其他人要妥善隐蔽了。华克之本人也按计划于第二天乘夜车离宁赴沪,到香港筹集经费,安排孙凤海的亲属,接济隐蔽的战友。然而,晨光社的一名勤务员

谷子丰在北站被捕后叛变,将志士们的线索一一供出。孙凤海的妻子崔正瑶,晨光社的贺波光、张玉华,以及与晨光社有来往的人和亲朋好友都被株连入狱者无数。

孙凤海的妻子崔正瑶在戴笠严刑拷问一无所获后被杀害。帮助华克之筹款的王亚樵被指为“主谋”遭暗杀。陈处泰在探望崔正瑶时被捕,敌人将他杀害后又将其的尸体投入镬水池中。

华克之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军统大特务沈醉奉戴笠之命,穷追不舍,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有几次险些抓住,又被他巧妙逃脱。晨光社功败垂成,以及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给华克之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亲友们及无辜者的鲜血让华克之痛切地认识到,靠几个人的力量搞暗杀活动,不仅对革命没有多大帮助,反而会招致反动派的疯狂报复。

1936年冬天,他在香港发表了揭露刺蒋汪精卫真相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宣称11月1日刺蒋行动的目标是蒋介石,目的在于为中国革命搬掉阻碍路基石,只可惜蒋介石没有出场,只得刺蒋二号卖国贼汪精卫。他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革命志士的罪行,大声疾呼:“与其生而待之,孰与伐之。”华克之把宣言用九龙总商会的信封挂号寄给蒋介石,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将悬赏金额由五万大洋提高到十万大洋。然而华克之此时已经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决定按照陈处泰烈士的遗训: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追随“三民主义”的热血青年

华克之原名华毓,1902年12月20日出生于宝应县水镇五里埭村的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他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小学毕业时学习成绩全校第一名,后进入南京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20年,华克之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二年级时阅读了孙中山的著作,树立起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常以“三民主义信徒”自诩,并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不久,华克之当选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了当时还处于地下的中国国民党,经常以学联代表身份参加校外社会活动。毕业时,华克之被保送进金陵大学读书。

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华克之作为工作人员随江苏省代表列席会议。随后,南京的国民党地方党组织进行改组,华克之被选为国民党南京市南区党部委员,随后又当选为金陵大学学联理事。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华克之积极参与组织南京市“五卅惨案”后援机构,发动全市人民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和捐款、捐物活动,不久,华克之被选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并担任青年部长。当时,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有7个委员组成,其中包括了宛希俨、侯绍裘、肖楚女等共产党员4人,华克之与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正当南京人民为庆祝南京“光复”欢欣鼓舞之时,蒋介石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于4月9日指使流氓捣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秘密逮捕并杀害宛希俨、侯绍裘、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紧接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正式上演。面对蒋介石的血腥杀戮,华克之毫不畏惧,于4月12日晚联系了部分人,以他个人名义贴出海报,召集全市国民党员集会。4月14日上午,南京市6000多名国民党员和左派人如期赶到城南女师大参加集会,华克之在会上揭露和声讨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遗训,清党反共,分裂革命,镇压群众的罪行。会上,通过了《要求中央制止继续北伐的决议案》,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华克之等人的公开挑战引起了蒋介石反革命势力的恐慌。蒋介石先是亲笔写信派人带给华克之,要与之面谈,劝说他放弃三大政策和反蒋立场,归顺蒋介石,被他严词拒绝,并在一首诗中写道:“可绝六亲求民主,怎为五斗事暴君?坚持三民三政策,神州山雨有知音。”因此,华克之三人监狱,备受折磨,幸亏国民党内的几位朋友多方营救,甚至请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得以脱困。

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



1948年,华克之在香港进行地下工作时与夫人朱蕙凤合影。

1937年4月,华克之在中共华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来到延安。5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华克之,二人做了深入长谈。毛主席不同意华克之留在延安,那样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等,他让华克之仍回华南,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几天后,华克之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密电件南下,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途。1938年秋,华克之见到华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和潘汉年。廖承志安排华克之回上海收集日、伪、蒋三方面的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亲自批准,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冬,华克之在潘汉年指示下,为获得日伪军核心机密,动员他的知交、国民党元老人士任庵任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打入汪伪政权上海市市长周佛海身边,成为周佛海的座上客。继而,任

庵将华克之介绍给周佛海,让华克之成为周佛海的贵宾,不断获取机密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要他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攻。华克之迅速将这份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

1945年秋,日本投降不久,华克之扮成一名国民党中将,与能言善辩的正义商人郑德合作,巧妙套住了日本军官冈田少将,经过几次心理战,使冈田“主动”为新四军先后提供了540板箱烈性炸药和194挺机关枪。这些军火在华克之等人的安排下,顺利转到新四军军部。

解放战争期间,华克之仍然战斗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为党工作。1946年的一天,华克之冒充上海《时事新报》记者,乘坐自己人开的汽车,闯进司机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队长刘善本在上海家里,在大批

军统特务眼皮下,向刘善本夫人当面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的消息,传达党中央对他们的亲切慰问,并告知如何脱离险境、平安出沪的办法。1948年初,战场逐渐从解放区向国民党统治区转移,我军急需精确的大比例尺军用地图。华克之从蒋介石国防部窃取到严密保管的军用地图,将其送到香港,然后由潘汉年转交到中共华南分局。他还在军统特务的层层监视下,将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亲笔信送至宋的手中,并将宋的回信安全取出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华克之仍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然而,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中,他的老上级潘汉年以“反革命罪”被诬入狱,一大批在隐蔽战线与潘汉年共事的战友和部下受到牵连。同年5月21日,华克之被捕,被诬为潘汉年的“二号黑干将”,失去自由长达24年。1979年,在廖承志的直接干涉下,华克之案得到平反。之后,华克之开始书写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便有回忆潘汉年的《风雨话当年》。1998年1月7日,华克之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 本文供稿:苗广远 王婷婷 唐善刚

新四军建立在日伪心脏的抗日“同情区”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的胜利,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迎来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发展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宝应县地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结合部。当时,宝应地区日伪势力犬牙交错,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开辟宝应抗日根据地对于进一步扩大苏中抗日根据地,连通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各抗日根据地意义重大。1941年5月,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决定多路并进开辟宝应。9月,新四军第一师二旅六团一营组成“高宝支队”,一师二团组成“挺进支队”分别进入宝应,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取得攻打日伪军王通河据点和王营据点等战斗的胜利。10月中旬,新四军六师十八旅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农村地区,在苏中区委统一部署下,派出大批民运工作队,以连为单位,建立区公所及党的各级组织。十八旅政治部民运科长刘烈人率领民运工作队,随同该旅五十四团一营进入宝应、高邮交界处的临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刘烈人(1910—1982),四川安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领的民运工作队针对当时临北地区刀会、联庄会组织盛行,群众对新四军还不了解的情况,采取了先建立抗日“同情区”,再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步骤。在抗日“同情区”内,新四军对老百姓不征粮、不收税,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广大群众的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同时,及时吸纳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组织,成立我党领导下的“专打日伪保家乡”的民兵组织“抗日自卫队”。随着“抗日自卫队”的不断壮大,地方领导权逐步转移到我党领导下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手中,民运工作队趁势加强对该地区刀会组织的改造工作,绝大多数刀会成员和联庄会成员纷纷加入民兵组织,刀会、联庄会逐渐消失。新四军在临北地区建立抗日“同情区”的举动

引起了日伪军的极大恐慌,日伪军一次次组织了对临北抗日“同情区”的大扫荡,新四军及民兵则依靠群众一次次取得反扫荡的胜利,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战斗中涌现了许多抗日战斗英雄,其中有新四军干部林友映、秦河乡民兵队长程宝丰等。

林友映,1915年出生,菲律宾华侨,祖籍广东。“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从南洋回到祖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1938年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任新四军六



林友映烈士

师十八旅五十四团党委委员、一营政委。林友映带领部队在开辟临北抗日“同情区”的战斗中,多次粉碎了日伪军扫荡,先后取得临泽镇、大李庄等战斗的胜利。1942年4月8日,日伪军百余人再次到临北地区的王营郭氏桥扫荡,林友映率两个连包围了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民兵和群众

1000余人前来助战,敌人慌忙撤至吴家祠堂。正在他率部猛攻祠堂时,敌军援兵赶到了。为掩护群众和战友突围,林友映端起机枪猛烈扫射敌人,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27岁。抗战胜利后,当地政府把烈士牺牲地命名为“友映乡”。

程宝丰,1919年出生,宝应县夏集镇人,贫雇农,是民运工作队于1941年冬在临北地区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任秦河乡民兵队长。他作战十分勇敢,带领民兵活跃在临界公路上,破路、拆



程宝丰烈士

桥、割电话线,袭击日伪军,多次参加新四军攻打日伪军战斗,并配合农抗会开展减租减息等工作,敌人对他又是恨又怕。1943年10月10日拂晓,日伪军两个连窜进民兵驻地刁圩,程宝丰为掩护其他民兵转移,把日伪军引向自己,不幸被俘。程宝丰被俘后,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和金钱

利诱,始终坚贞不屈,3日后在王营西首被日寇杀害。1944年,中共宝应县委、苏中一分区司令员邵道程宝丰为民兵战斗英雄。

民运工作队在开辟抗日“同情区”过程中,重视团结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冯立生,1905年出生于赵家上海《时事新报》记者,乘坐自己人开的汽车,闯进司机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队长刘善本在上海家里,在大批



冯氏补习团创办者冯立生先生

师、南京中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故里。南京伪教育部函邀他去编写数学教科书,被他断然拒绝。1941年冬天,日寇占领宝应,高邮运河沿线等交通要道,设据点、建炮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敌占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失学青年不愿再进入敌占区危城接受奴化教

育。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位学生家长敬仰冯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共同聘请他为失学青年办一个中学补习班,冯立生慨然应允。这个补习班最初就在郑渡村的一位失学青年家中,入学时只有7个人。但开学后没几天,听到他的失学青年纷纷要求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同学们称补习班为“冯氏补习团”。补习团的创办很快得到了民运工作队的重视,刘烈人等负责人不时来看望和慰问冯立生等老师,鼓励、支持他们把在敌后为人民办学的事业坚持下去,并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赠送《资本论》《国家与革命》《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书籍。民运工作队的同志还常去补习团与学生打成一片,宣传抗日主张,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冯氏补习团”从1941年冬创办至1944年上半年结束,历时4年,先后办了7个学期,累计近200人次受教,大多数同学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宝应临北抗日“同情区”范围主要为宝应县夏集镇王通河以南,汜水镇以东,柳堡镇以西,高邮市临泽镇以北约200平方公里的范围,总面积并不大,但为新四军在宝应地区站稳脚跟,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3月至5月,中共湖东工委、湖东行署成立,刘烈人任工委书记,刘克白、周鄂、杜文白先后任行署主任。1943年春,淮北区党委决定成立运东工委,武装开辟逐步向柳堡、汜水、安丰、射阳等地推进。不久,淮盐宝边区办事处成立,彭冲、刘烈人分别任主任、副主任。1943年5月,中共苏中宝应县委、宝应县政府于西安镇成立,刘烈人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实现了对全县根据地建设的统一领导,宝应的抗日战争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本文供稿:杨清 陈霞 张丽

本期协办:宝应市档案局 本期编辑:苏海霞